

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比喻

既要重『面子』，更要重『里子』

□ 马秀莲 王纪超

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建设城市地下管网是城市的“里子”工程，“咱们中国传统都是要面子，实际面子里子要一起要，更要重里子”。

里子，指物品的里面或内部；面子，指它的外在表现形式。里子靠面子来表达，面子靠里子来支撑，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习近平总书记用“面子”和“里子”这对关系来生动形容地面上的城市形象和地下的城市管网之间的关系，强调在城市建设和管理工作中，要高度重视地下管网的建设管理，夯实城市安全发展根基。

城市中目之所及，令人耳目一新的建筑地标、鳞次栉比的高楼、车水马龙的大街、悦目怡心的公园等都是它的“面子”，也是城市建设管理者着力打造呈现给大家的。城市中看不见的地下管网，即满足城市生活生产需要的给水、排水、天然气、热力、电力、通信等市政公用管线，是它的“里子”，保障城市的运行，是城市经济社会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中国人注重面子，在城市建设管理中自然也能体现出来。在我国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人们往往更多关注城市建筑、

道路、景观等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城市建设管理者也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让楼更高、街更宽、环境更加优美等“面子”建设上。而相应的，对于地下管网这一“里子”建设，重视程度和建设管理力度却相对不足。长此以往，不少城市“面子”有余、“里子”不足，问题愈发凸显，轻则水、电、气、热、通信等保障中断时有发生，影响生产生活；重则引发城市公共安全问题，威胁城市居民的生命安全。

“面子”是城市的形象，“里子”是城市的支撑；没有“里子”的过硬，就不可能有“面子”的长久。在城市建设过程中，要深刻认识地下管网的重要性，坚决破除城市建设管理中重“面子”、轻“里子”的错误做法。要统筹地上和地下，科学编制城市地下管线等规划，做到“里子”“面子”一张图；先规划、后建设，先地下、后地上合理安排各类设施建设时序，提高城市基础设施的整体性、系统性。要统筹当前和长远，既要着眼当前，依据城市总体规划合理设计地下管网，又要放眼城市未来发展需要，合理确定地下管网设施的空间位置、规模、走向等，为城市地下管网承载能力和保障能力预留充分的裕度。要统筹建设和运行，既要严格落实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竣工测量等制度，严把“面子”和“里子”的建设质量；又要考虑后续运行需求，安排相关主体提前介入，尽最大可能避免规划建设阶段问题影响基础设施后期运行，避免因“里子”而伤了“面子”。

城市建设和管理更要重“里子”。当前，各地城市更新工作如火如荼，要抓住机会，同步提升地下管网承载能力和安全运行水平，把城市的“里子”搞得更加过硬。加紧摸清地下管网底数，开展基础信息普查，建立基础信息数据库和分级分类台账，为更高水平地建好管好“里子”提供支撑。加紧推进地下管网老化更新改造，全面排查地下管网自身结构性隐患和周边环境影响隐患，结合燃气等管线老化更新改造、老旧小区综合整治等，统筹实施更新改造和隐患治理，全面提升“里子”工程的保障能力。加紧实施地下管网信息化智能化升级，构建感知监测体系，增强地下管网状况监测、风险预警、隐患管控、事故处置等能力水平，以科技赋能增强“里子”工程韧性、夯实城市安全发展根基。

城市建设只有“面子”“里子”一起要，才能实现地上设施建设发展与地下管网建设运行的相得益彰。“里子”愈厚实，“面子”才愈靓丽，人们住着才会更放心、舒心，城市生活才更美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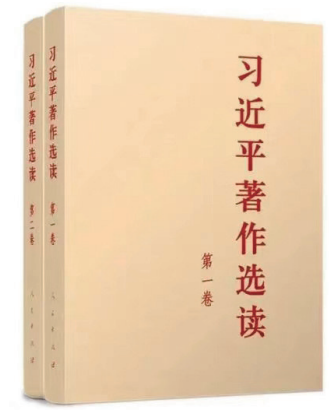
充分认识和自觉顺应城市发展规律

——读习近平总书记《做好城市工作的基本思路》

□ 付高生

习近平著作选读

重读经典



《做好城市工作的基本思路》是2015年1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任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收录在《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这篇重要文献深刻揭示出城市建设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科学阐述了做好城市工作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为推动新时代城市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科学指南。

对党的城市工作本质属性的深刻揭示

人民群众是城市建设和治理的主体，是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动力源泉和深厚根基。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城市工作，始终致力于建设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城市。习近平总书记在这篇重要文献中指出：“做好城市工作，要顺应城市工作新形势、改革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这是

我们做好城市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一重要论述首次提出了“人民城市”概念，深刻揭示出党的城市工作的本质属性，是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中国化的生动呈现。

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要抓住城市管理和和服务这个重点。城市管理和和服务涉及市民每天的吃用住行，其管理方式和服务水平直接影响着市民的生活质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的核心是人，关键是十二个字：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乐业。城市工作做得好不好，老百姓满意不满意，生活方便不方便，城市管理和和服务状况是重要评判标准。”这就要求改变粗放型管理方式，悉心回应市民关切，不断提供精细的城市管理和良好的公共服务，让市民享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的城市生活。

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要把创造优良人居环境作为中心目标。由于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忽视人居环境建设，导致有的城市人居环境建设跟不上城市经济增长速度，市民生活品质受到不小影响。这就需要进一步明确城市发展指导思想，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满足市民对宜居生活的高品位需求，着力在增强城市内部布局的合理性、实现城镇居民住有所居等方面下功夫，努力把城市建设成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

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要鼓励市民积极参与城市建设、管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市民是城市建设、城市发展的主体。”这就要求城市政府尊重市民的主体地位，保护市民对城市发展决策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持续提高市民的文明素质，助力高水平文明城市建设；创新城市治理方式，从“划桨人”转变为“掌舵人”，同市、企业、市民一起管理城市事务、承担社会责任，推动实现城市共治共管、共建共享。

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要延续城市历史文脉，让市民“记得住乡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一个民族文化和情感记忆的载体，历史文化是城市魅力之关键”。城市建设和管理中要敬畏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好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并在这种保护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历史传承、区域文化、时代要求塑造出彰显历史底色、地方本色、时代特色的城市精神。

对城市发展规律的深化认识

城市发展是一个有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遵循城市发展规律是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工作中出现这样那样问题，归根到底是没有充分认识和自觉顺应城市发展规律”。在这篇重要文献中，习近平总书记坚持问题导向，深刻揭示了我国城市建设和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挑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做好城市工作必须遵循的三条规律。

首先是必须认识、尊重和顺应“城市和经济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规律。做到城市建设规模与经济发展体量相匹配，不搞脱离经济发展的人为“造城运动”，加强对新城新区规划建设的审批管理。其次是必须认识、尊重和顺应“城市发展是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农业用地按相应规模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的过程”的规律。这就要求相关部门和地区注重人口和用地的匹配，有序有效推进城镇化，避免出现城市发展占用农业用地、人口却融不进来所导致的资源闲置、损害农业发展等问题，以及避免重视白领、忽视蓝领所导致的人才结构失衡等问题。最后是必须认识、尊重和顺应“城市规模要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的规律。注重城市生态空间与城市建设空间相匹配，避免出现由于城市过

用系统思维推进城市工作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城市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做好城市工作需要坚持和运用系统思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工作要树立系统思维，从构成城市诸多要素、结构、功能等方面入手，对事关城市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周密部署，系统推进各方面工作。”

运用系统思维推动城市工作，就是要运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充分认识城市及城市工作的系统属性，在此基础上实现对城市工作的综合平衡、整体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在这篇重要文献中提出的“五大统筹”就是运用系统思维推动城市工作的集中体现：其一，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提高城市工作全局性；其二，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提高城市工作的系统性；其三，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提高城市发展持续性；其四，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提高城市发展的宜居性；其五，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提高各方推动城市发展的积极性。实践证明，只有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抓好这“五大统筹”，才能正确处理各方面关系、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顺应城市工作新形势、改革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朝着构筑新时代宜居宜居的“人民之城”的目标不断前进。

清史园地的卓越耕耘者

——历史学家戴逸的治学之道

□ 黄爱平



“清史是我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这是历史学家、清史泰斗戴逸的深情告白，也是他毕生学术道路的真实写照。

“逆向回溯”，缘定清史

戴逸治学，是沿着“逆向回溯”的路径进行的，即从中国革命史上溯到中国近代史，最终定格在清史。这一独特的治学路径，与他人的际遇和工作经历密切相关。戴逸1926年出生于江苏常熟，自幼酷爱文史，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走上历史学习和研究的道路。1948年因参加学生运动遭到国民党政府通缉，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奔赴解放区，进入华北大学学习，结业后留校，在历史学家胡华的领导下从事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工作。1950年，华北大学进京，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中国人民大学。自此而后，戴逸便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

新中国成立初期，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的才极为缺乏。由于工作需要，戴逸承担了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任务。他夜以继日地阅读史料，思考问题，通过几年的教学实践，对中国近代历史有了系统、深入的了解，也形成了一些新观点，由此萌生了编写一本中国近代史的想法。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戴逸笔耕不辍，1958年，《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问世，其新颖的论

点、严密的论证、流畅的叙述赢得了学界和读者的赞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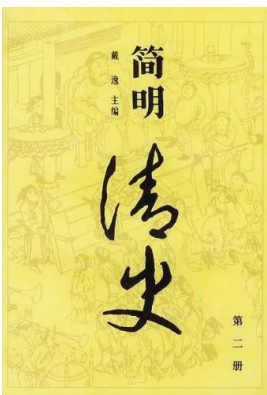
“文革”期间，戴逸因主要执笔的《论“清官”》一文受到批判，下放到江西余江“五七”干校劳动，直到1973年回到北京。时值中国和苏联两国边境发生冲突之后不久，在边界问题谈判中，涉及两国边界争议诸多历史问题。戴逸受有关部门委托，研究清代历史上的中俄关系。他广泛搜集档案、日记等第一手资料，撰成《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以严谨的考证，厘清了康熙年间中俄双方签订《尼布楚条约》的史实，为当时中国政府处理中苏边境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文革”结束后，鉴于鸦片战争以前的清史研究是学术界的薄弱环节，许多空白亟需填补。戴逸首倡并主持编写《简明清史》，他大量阅读历史资料，梳理清代历史的发展脉络，思考其中的重要问题，认真审阅全部书稿，甚至逐章、逐节、逐句、逐字重新写定。该书问世后在学术界产生了极大影响。

自此而后，戴逸便一直在清史园地辛勤耕耘，广泛开拓清史研究领域，大力推进清史研究。在他看来，清朝处在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开始过渡的重要时期，时间跨度很长，距离现在最近。因此，要了解和掌握中国的国情，就要对清朝的历史有全面、深入的了解。正是缘于这一理念、这份执着，戴逸甘愿以清史为职志，数十年如一日，“寝于斯，食于

斯，学于斯，行于斯”，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献给了清史事业。

“把清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

长期以来，在现行的学科体系之下，清史被切割为两段，以鸦片战争为界，鸦片战争以前的清史归属于中国古代史，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则称为中国近代史。改革开放之前，前半段鸦片战争以前的清史特别不受重视，研究成果寥寥无几。后半段即1840年以后的历史极受重视，但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反帝反封建的重大事件，实际上是从革命史的角度研究这80年的历史，而不是从清王朝的角度研究清史。戴逸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问题，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他就大力倡导“把近300年的清代历史当作完整的研究对象”，他说：“清史是指清朝统治时期的整个中国史。它的范围，从纵的方面说，应包括清朝兴起、发展和衰亡的全过程；从横的方面说，应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它的起迄时间，从1644年清朝入关、建立全国统治后，经过康熙乾隆盛世以及鸦片战争后的衰落，直至辛亥革命、清朝灭亡为止，共268年。如果上溯清朝入关前努尔哈齐和皇太极时代的历史，则长达近300年。”这一研究范围的拓展和确定，奠定了40多年来清史学科领域



突飞猛进的基础。而戴逸更是身体力行，由中国近代史上溯清史，继《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简明清史》后，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清代边疆和清代人物。边疆的统一和发展是清朝的重要业绩，戴逸研究清代的边疆和民族关系，思考边疆治理开发与近代化的关系，主持撰写了《中国西部开发与近代化》。对乾隆帝这位清代极具特色又最为复杂的历史人物，戴逸尤感兴趣，他爬梳史料，结合时代特征，分析人物性格、意志、才情、爱好、思想、作为等，撰成《乾隆帝及其时代》。他主持并推出《清代人物传稿》《清通鉴》等重大研究成果，都反映了他在清史研究领域的成就和贡献。戴逸也由此确立了清史研究领军人物的地位。

“清史研究要有世界眼光”

与前代王朝的历史相比，清代历

史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这就是清代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很多方面深受世界的影响，清朝已成为全球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戴逸特别强调，研究清史要有广阔视野、要有世界眼光。早在撰写《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时，他就已经意识到，清代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不仅是清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中的不少问题还与现实有着密切联系。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联系日益紧密，戴逸更为深切地体会到：“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只有把中国放在世界的坐标系中，才能认识中国的真实地位和状态，而世界又必须包括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抛弃了中国史，世界史就不是完全的世界史。”

20世纪90年代初，他认真研究中日甲午战争的历史，梳理这场战争的前因与后果，将其置于东亚时局乃至整个世界格局中进行比较分析，撰成《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等一系列论著，深化并推进了学界对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研究。此后，又将目光上溯至18世纪，组织学术团队，从政治、军事、边疆民族、农民、经济、社会、思想文化以及对外关系各个方面，对18世纪的中国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同时尽可能把当时的中国置于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加以分析比较，出版了《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丛书。该书的出版开创了对18世纪这一重要而独

特历史时期中外比较研究的先例，也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认可。21世纪初，国家《清史》工程正式启动，戴逸被任命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主持纂修工作。他不顾耄耋之躯，设计编纂方案、制定工作规划、建立学术机构、组织编纂队伍、斟酌体裁体例，以全部心血精力，引领这项文化工程有序开展、逐步推进，迄今已取得重要成果。

戴逸不仅在学术上成就卓越，而且在为人方面也有口皆碑。他温文儒雅，虚怀若谷，尤为爱惜人才，提携后进，对自己的学生更是倾注了十二分的关心。他的博士生研究《四库全书》，需要阅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资料，他亲自给馆领导打电话，请他们提供方便。外地博士生的家属来京无处安身，他把学校照顾他临时休息的房子供其居住，直到学生顺利毕业。至于年轻学子的新作问世，学界的研究成果出版，往往多有求序跋之事，他也乐见其成，有求必应，且都能写出新意，提出创见，给人以思想的启迪。戴逸曾专门著文论述对历史学家的四项要求：资料、思想、文采、道德。而他的治学为人，正是实践这四项要求的典范。

